

林行止，〈發水樓損害競爭力 再闖世界為時未晚〉

《知味尋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年）。

1. 作者認為香港在「競爭力排名」中倒退，主因不在於「政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在於香港「富二代」只着眼於賺錢太易的「發水樓」，無意從事「邊際利潤較低的行業」。你是否同意他的說法？
2. 「發水樓」除對民生外，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發展有甚麼影響？應該怎樣解決有關問題？
3. 作者提到港商在內地發展，因不同的法制、意識形態及官場文化的差異，會遇上種種難以克服的障礙。你是否同意他的說法？
4. 作者稱讚以「起樓」起家的長江實業走進世界，並認為這是「攻守自如令企業代代相傳之至道」。你是同意他的看法？又，長和系公司銳意走進世界，但李嘉誠近年卻被某些人士斥為「走資」，內地甚至出現「別讓李嘉誠跑了」的說法。你怎樣理解這些批評？

學大獎榜」(Science Prizes, Selected)上，早於2002年成立目的在鼓勵天文、生命科學、醫學及數學研究且獎金甚豐的邵逸夫獎，竟然十大不入；而與諾貝爾獎同列十大的，則有港人非常陌生、獎金只有五萬多美元的「朝日（《朝日新聞》）文化賞」、今年才成立的伊麗莎白女王工程獎（Queen Elizabeth Prize for Engineering）以至不設獎金的「搞笑諾貝爾獎」（Ig Nobel Prize）……。香港在這類科學貢獻上，雖然出手大方、獎金以百萬美元計，但似乎無大建樹，未為國際學界認可（評審公正性未被確認？）：因此不為國際社會重視。

〔政治困局中的經濟出路，二之一〕

2013年6月25日

發水樓損害競爭力 再闖世界為時未晚

三、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由兩岸四地及海外學者組成的「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及「中科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本月中旬發表的報告，顯示香港的「競爭力排名」均明顯倒退。若干論者指出導致香港競爭力褪色的原因，為「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筆者對此並不完全同意，以世界各地皆存在這樣那樣的社會矛盾（別說黨爭刀光血影，民眾上街時有所聞），香港的情況不算嚴重……。筆者認為令香港商業競爭力略遜從前的根本原因，是絕大部份「富二代」不願從事商業冒險有以致之；「富二代」這種「商格」的形成，主要來自「發水樓」賺錢太易之故。

過去數十年，特別是回歸後十四五年，向政府投得據地積比率可建十萬方呎樓面的土地，發售時樓面面積起碼在十五萬方呎左右，地產發展商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便獲得暴利（香港這個蕞爾小島有那麼多躋身世界豪

富榜的富翁，可知物業發展利錢之厚！），基於對後輩的愛，為免他們多勞少得，缺乏世界視野、保守因循的第一代發展商，因此不會鼓勵後代去從事邊際利潤較低的行業，他們的後代看在眼裏，物業以外行業哪會看得上眼，用大力去經營一些回報遠遠低於合法賣發水樓的生意，精明之士又豈願為之？香港當然有一些非靠發水樓致富的工商界及娛樂業人士，只是比起物業發展商，他們只屬極少數，所賺的不僅是「辛苦錢」，且為蠅頭小利（艱辛地經營工廠的年收入可能比不上賣一層高級發水樓！），他們的後代如有選擇，當然不會追隨先人足跡……。結果掌握最多經濟資源最優人力資源的香港商界精英的後代，除了物業發展（包括「回國投資地產」），寧可在品紅酒和吸雪茄上用工夫，甚麼都不想做；多年下來，「不願」變成「不會」，這正是香港商業競爭力大不如前的底因！

6月號《信報月刊》（第四三五期）的特輯「重建香港創業之都」，大概便是編者看到香港經濟發展陷入困局而及時推出，特輯由經驗與學養俱豐的創業理論家和實踐家執筆或通過訪談道出創新和成功創業的要素，不僅切合時宜且具鼓勵作用，有志於此者不宜錯過。不過，別說創業維艱是商界中人無人不曉的硬道理，加以上香港當前政治爭拗不絕甚至可能演化為街頭（流血？）衝突的緊張氛圍，令商業投資蒙上一層過去從未之見的不明朗陰影和不安定風險，在香港工商發展

已近飽和的前提下，赴內地和向海外發展，看來會成直接投資主流。值得提醒各位的是，赴內地投資，除了有因應不同法制的徬徨，且有不能（無法）牟取暴利的規範（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會讓資本家獨肥）；更重要的是，習慣了打賞「曾有利於公司發展」官員（即以「零用錢」賞給在位時「合作」的官員）的資本家，在內地碰上的官員，要麼公事公辦，讓你討不了便宜；要麼想分你的身家，絕不是給點賞錢便能打發。要知道，在西方國家，官員謙稱「公僕」（過去還會在此前加上「你的」二字），雖然九成九名實不符，然而，由於監督其辦事的獨立部門、議會和傳媒「虎視眈眈」，官員一般做事較有分寸（包括期望被打賞的數字）。內地官員是父母官（是否騎在人民頭上姑且勿論）；加以有不認同資本家魚肉消費者的政治認知，因此內地與香港的「官商勾結」有本質上的差異，港商要克服這重障礙，不是易事。在這種大環境下，少數高瞻遠矚的發展商看清發水樓不可能永遠存在，因此不嫌「薄利」（相對發水樓而言），走多元之路並因看到香港及內地的局限而向海外發展，長江實業便是佼佼者（有興趣者請參考2010年9月8日作者專欄〈指導性民主 半憂喜風光〉，收台北遠景《攀梯登月》及本港天地《2010年當年》）！

四、

本月20日，長和系四家公司長實、長建、電能及

李嘉誠基金宣佈組成合營公司，斥資九點四三六八億歐羅，向Van Ganswinkel Group BV收購其未上市的荷蘭最大規模（市場佔有率約二成四）廢物再生能源公司AVR Afvalverwerking BV，此為李嘉誠旗下公司繼今年1月以五億多紐元買下該國的Envio Waste公司後第二宗同類收購。此間媒體報道這些新聞時，均指收購的是處理垃圾公司，殊不知這些公司，俱為利用最新科技把垃圾化為最環保和比較廉價能源的先驅企業！

廢物再生能源（waste - to - energy）是「廢物」的最有效「利用」，而這種新科技已令北歐能源業脫胎換骨，走在時代尖端；香港近來為不知如何適當地處理「廢物」（垃圾）而傷神，北歐的挪威和瑞典卻都因「廢物」供應不足而必須從英國、愛爾蘭等國進口。為何要輸進垃圾？以此二國專門熔化垃圾的「焚化廠」容量，早已超逾本地垃圾的供應量。香港現在仍在為物色垃圾堆填區而「忙」，但燃燒垃圾使之變為能源的工業，已成為全球四十多國家（共約四百家「焚化廠」）的既環保又廉價能源的來源。現代科技能以華氏二千度的高熱把垃圾熔化、產生能源，而且不會散發氣味，亦不致像垃圾堆填區發出污染大氣的甲烷（沼氣）。

近年北歐為減低溫室效應而在研發再生能源上投下巨資，取得驕人成就，高溫熔化垃圾使之化為能源，便是眼前的例子。如今挪威首都奧斯陸全市約一半能源來自「廢物再生」，可是，重視再生能源令北歐諸國商

界投下巨資，如今她們共有足以每年熔化七億多噸垃圾的「焚化廠」，但她們的總垃圾量每年只有一億五千餘噸，進口垃圾遂成為這些國家的「要務」。一如前述，挪威已在進口垃圾，瑞典每年的垃圾進口量亦在八十萬噸水平……。向北歐輸出垃圾，也許是同時可以「振興航運」的「新興行業」。香港垃圾若能出口至北歐，不僅可省「政費」，且可免去當局與議會就如何處理這堆廢物而爭吵，當然亦可免去受害群體（想不通為何要他們所屬地區被定為「共同承擔」的主體）上街示威引致社會不安寧！環境局的高官認為擴建垃圾堆填區為處理垃圾的唯一選項，今天議會若不通過，必會再接再厲，再申請撥款，與民意對立，意態甚決，這豈是營造和諧社會的良方？環境局有否考慮與這方面的先行者長實集團商討能否引進「廢物再生能源」設備或出口垃圾的可能——香港輸出垃圾，並非笑談，奧斯陸一名業界翹楚去週談及「本地垃圾供應短缺」時，便指出該國業商考慮向美國購買垃圾，因為「海運相當廉宜」（Sea transport is cheap）。香港垃圾外銷，以本港垃圾之多，可能是一門賺外匯的大生意。

香港人經商本有一手，只是近年因發水樓太易致富，令發展商坐享巨利，商界人人「眼紅」，遂人人「起樓」，對其他生意便不感興趣……。現在是時候重新振作了。以「起樓」起家的長江實業走進世界，非自今日始，且已獲得重大成就，雖然回報不及本港的物業

發展，卻勝在分散投資且保障可以持續增長。

香港商界應以長實為師，走向世界；趁本地股市仍充滿活力、國際鱷群戀棧未走的現在，加上2017年開始又有長期信貸、按揭問題要煩惱（遑論雙普選引致的「鬥爭」），從市場集資進而收購有前景（即使邊際利潤率不大吸引）的海外企業，才是攻守自如令企業代代相傳之至道！

〔政治困局中的經濟出路·二之二〕

2013年6月26日

舞男當管屁收放 生辰快樂有版稅

■小輩告以askthepast.blotspot.hk（hk不代表網址設於香港，只顯示香港人在用此網站；這種設計讓網主知道讀者來自何地）適合筆者的閱讀口味，閱之果然，有「公餘」看無聊雜事消遣者，不妨上網瀏覽。本月21日的〈如何在舞會中令女性對你另眼相看〉（How to Impress Girls at a Dance），以現代眼光視之，妙不可言：「再者，絕不能與女性共舞時放屁，咬緊牙根、收縮肛門，便可忍耐；不要流口水更不要流鼻涕……在妙齡少女面前別吐痰，因此舉令人反胃作嘔，若要吐痰或擤鼻涕，記緊側側頭；同時，千萬別用手指挖鼻孔，用手帕清潔鼻子則可；還有，請勿食洋葱，以其會令口臭……。」照足這些指示，舞男便不會為女伴嫌棄。

從這些具體而微的描述，反映當年——16世紀——歐陸的社會風氣與行為習慣，這即是說，其時當眾放屁挖鼻孔以至吐痰等，是日常並不鮮見之象；若非如此，這位名家便不會在「跳舞須知」中加上這些「戒條」！

雷鼎鳴，〈「雙城記」新篇：新加坡模式對港有何啟示？〉

《民主民生的經濟解讀》（香港：中華書局，2015）。

1. 作者引述經濟學家容格（Alwyn Yong）的研究，指出新加坡較香港成功的原因是甚麼？作者同意這些分析嗎？為甚麼？
2. 甚麼是「父愛主義」（paternalism）？香港政府可以參考借鏡嗎？
3. 香港可從新加坡的發展經驗中學到甚麼？香港的經濟發展的出路何在？
4. 綜合全文，你同意作者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分析嗎？請談談你的看法。

雷鼎鳴：《民主民生的經濟解讀》，香港：中華書局，2015。

「雙城記」新篇： 新加坡模式對港有何啟示？

香港近十多年來經濟增長緩慢，以致社會向上流動速度大不如前，當中所衍生的社會矛盾不計其數。社會中一些頭面人物對此難免心焦如焚，要改變香港經濟的發展模式。

董建華年代搞「大有為」政府，結果以全面失敗告終。現在有「適度有為」一說，因為用上「適度」一詞，其語意本身永不可能錯，但若無明確內容，則此說只是空話。經濟發展模式從來都是複雜的學問，牽一髮動全身，較安全的辦法是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

香港的天然參考對象是新加坡，正如新加坡不斷金睛火眼地盯着香港，要在此取經。

香港、新加坡兩地近似的地方很多，大家都是數百萬人口的開放型國際大都會，自由貿易、金融中心、華洋雜處、英國前殖民地、土地面積有限、人民教育水準與收入接近、人均壽命 81 歲、總和生育率都低企等等。

但新加坡雖然在經濟自由度的國際排名中不遜於香港，她所採用的政策卻的確與香港有重要的不同之處。這正好方便我們通過比較，找出新加坡的發展政策可帶來什麼後果。

新加坡經濟的表現，確有其突出之處。

2011 年新加坡的人均 GDP 已上漲至 50,123 美元，比起香港的 34,200 美元高出 47 %。

在房屋方面，2010 年新加坡 87.2% 的家庭，擁有自置物業，74.4% 的住戶單位更大過 1,100 平方呎。看到這些數字的港人能不暗自悲嘆乎？

港星有共通之處

新加坡固有她成功的一面，但我們卻不可單憑一些表面數據便遽然下結

論。例如，2011 年新加坡人的總私人消費只有其 GDP 的 39.4%，與香港同年的 65.15% 差別巨大。換言之，新加坡要把 GDP 的大比例抽走用以儲蓄及投資才支撐得住她的經濟增長，而留下來可以讓人民實際支配的消費卻不多。用絕對數字來看，2011 年新加坡人均消費是 152,000 港元，香港則是 174,000 港元，就算後者的十分一來自內地遊客的消費（實際上不會有這麼多），我們要打一個九折，港人的消費量仍稍勝新加坡。

要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我們要替她驗身照肺。

1992 年美國一位年輕經濟學家容格 (Alwyn Young) 發表了一篇題為〈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的學術論文，比較港星兩地的發展模式。他指出，新加坡當時所用的方法是通過其中央公積金強制地提高人民的儲蓄率，在八十年代後期，中央公積金的供款率最高曾達到僱員工資的 50%（僱主僱員各供 25%）。由於總儲蓄率等閒等於 GDP 的一半，新加坡的資本積累極為迅速，其政府則用低息發行債券，借走這些資金，再用以補貼政府所心儀的一些工業，這便是她工業政策經費的來源。

「父愛主義」作祟

這裏有兩個問題。

第一，新加坡的增長靠的是勒緊褲頭、減低消費、增加投資去體現。但資本愈來愈多後，因為報酬遞減律會發揮作用，新增資本所起的作用逐漸減弱，最後增長慢慢失去動力。

第二，倘若新加坡的工業政策成功，其政府挑選出來的行業因為得到資助而長足發展，或許可以成為新的經濟火車頭，抵消了報酬遞減律的作用。

但容格通過新加坡與香港的數據作出比較後發現，不斷推動產業升級的新加坡，其全要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增長卻極為緩慢，遠遠沒有搞工業政策的香港。換言之，新加坡政府以有形之手扭曲市場以圖揠苗助長加快產業升級，卻是事與願違，量度生產效率進步速度的 TFP 增長率竟是不及香港。容格由是斷言，新加坡經濟的增長前景有限，其有盡時。

容格的預測顯然並非全對。從 1997 至 2011 年，新加坡的人均實質 GDP 仍能以平均每年 3.02% 的速度增長，而不是完全停頓。在一些港人印象中，新加坡增長遠勝香港，但他們可能忘記了這段時間新加坡人口增加 36.6%，而且最近十年，新加坡貨幣相對於港元升值了 46%，致使新加坡經濟用美元計算時看來相當亮麗。

容格文章發表後的二十年來，究竟新加坡為其原來發展模式保留了什麼，及調整了什麼策略，以致報酬遞減律的殺傷力未見強勁？

有些策略新加坡沒有變。新加坡模式的背後思想是 paternalism（內地譯作「父愛主義」，有些怪異，但可用），即政府告訴人民，其政策都是如父親對待子女般為大家好，所以不要反對。人民是否認同新加坡政府父愛洋溢，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我們卻難以否定其政府確實十分精明，政府的政策往往是模擬自由市場而得出，其對市場發放出的訊號很多時都能快速回應。新加坡以前搞父愛主義，現在仍是。

在具體政策上，中央公積金仍在運作，僱主僱員合共的供款率現在已調整為薪金的 36%，2011 年國民總儲蓄率(Gross National Saving Rate)仍高達 45.3%，位於世界前列。新加坡政府仍在挑選要加以資助的戰略性行業，其推動工業政策的路向未見有變。但舊中有新，有兩項政策是過去所無，至少在規模上大不一樣。

其一是投資方針大幅改變。過去新加坡所積累到的資本基本上投資在本土，但正如上文所述，一個地方的資本太多，其回報率便會因報酬遞減律而下降。新加坡為了避開這後果，頗為聰明地把資金洩洪，轉投國外。2011 年，新加坡新增的國民儲蓄有 1,450 億元坡幣（約等於港幣 8,900 億），其中 717 億都轉到海外投資。

這是驚人的高比例，等於整個國民收入的 22.4% 都要往海外跑，而且年年如是。

避免「塘水滾塘魚」

這便難怪新加坡的主權基金財大氣粗，香港著名地標之一的「又一城」2011 年也被其收購。新加坡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資金在境內「塘水滾塘魚」，減低報酬遞減的影響，但其不希望把資金回饋人民消費的心態亦彰明甚。新加坡政府的內債高達其 GDP 的 108%，她正是通過公積金買入政府債券，政府手上有錢後又送到境外投資。

其二是她的人口政策。新加坡 2011 年有人口五百一十八萬四千人，比起 1997 年不足三百八十萬人增幅驚人。新加坡的出生率極低，為何人口有此增長？原因是其人口中的非本地居民大幅上升。在這五百一十八萬四千人口中，非本地居民的佔了一百三十九萬四千人，等於總人口的 27%。

這規模龐大的移民政策同樣可部分化解報酬遞減的壓力。人多好辦事，勞動力多了可增加資本的投資回報。不過，更重要的，應不是人口數量上的增加，而是新加坡政府千方百計的吸納東南亞，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精英到那裏讀書並留下工作。

新加坡挖角的動作很大，以前坡幣匯率低，我們不用理會他們，但坡幣匯價大幅上升後，對我們的威脅頗大，我不少同事都曾被挖走，但幸好我們也不是全無還擊之力。

香港可學的經驗

香港可從新加坡的經驗中學到什麼？

首先，她的政府能推動政策，是因為其人民樂意或無奈地接受父愛主義的思想。從香港的政治環境及人民渴求自由的角度觀之，新加坡不少政策絕難在港行得通。要港人把工資的 36% 放在公積金，港人肯嗎？要港人只消費收入的 39%，做得到嗎？用公眾的財富搞工業政策津貼某些行業，非受惠者如何反應？急速輸入等於本地居民四成的移民，是否可行？香港政府根本沒有權威去實施什麼父愛主義。

第二，新加坡引入人口的過程中亦積極填海造地建房子。正因為她長期投資於建造房屋，新加坡的房屋供應遠勝香港。近三、四年來，新加坡房價雖上升了三、四成，但不足 300 萬港元，仍可買到千餘尺的住宅，房價比香港便宜得多。

香港樓價連年上升，正是自由市場不斷發放訊號，告訴政府土地不足，樓宇供應不夠，但政府一段長時間內並無理會市場發出的訊號。新加坡的土地政策應該值得研判。

新加坡的工業政策是否成功，是否值得效法？我看不是。從 2004 年至 2013 年，據官方數據，新加坡的 TFP 平均每年只增加 1.1%。

這並不是突出的成績（中國有 3%）。我們也知道，在同一時期，新加坡對科研的投入高達 GDP 的 2.2% 左右（中國有 1.6%，香港則只得 0.76%）。在正確的科研投資及人力資源政策下，新加坡的 TFP 增長仍是這麼慢，難免使人懷疑她的工業政策是否在拖後腿。

從市場邏輯來看，一個行業本身若有活力，只要政府替它掃除一些障礙（例如吸納外來人才的障礙），它自然便可發展，不用耗費納稅人的稅款去補貼。若無活力，不符成本效益的，補貼只等於向一些善於游說的商人輸送利益。新加坡政府能幹又「夠惡」，其工業政策的效果最多也只算是差強人意，香港若模仿，又怎會有好結果？

黃偉豪〈盲創科：被遺忘了的管理科技人才〉（節錄）

《明報網上版》〈文摘〉 2021 年 11 月 8 日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11108/s00022/1636017909147/%E7%9B%B2%E5%89%B5%E7%A7%91-%E8%A2%AB%E9%81%BA%E5%BF%98%E4%BA%86%E7%9A%84%E7%AE%A1%E7%90%86%E7%A7%91%E6%8A%80%E4%BA%BA%E6%89%8D%EF%BC%88%E6%96%87-%E9%BB%83%E5%81%89%E8%B1%AA%EF%BC%89>

1. 鑑於疫情影響科技人才流失，以及全球對科技人才競爭劇烈，政府是否需要全面評估本港現時及未來不同科技範疇人才的供求情況？
2. 香港的發展模式沿襲殖民地時代的理念，官僚由上而下帶動發展，這個模式於今天出現什麼問題？
3. 香港高等院校培養科技人才方面出現什麼問題？可見將來本港的科技發展環境如何適應市場變化？

盲創科：被遺忘了的管理科技人才

（文：黃偉豪）

說到香港創新科技的人才發展，除了要有直接研究及操作科技的人才之外，負責策劃及管理創科的人才也絕不可少。但現時的重點卻往往是集中於前者，而忽略了後者。這個不平衡若不被糾正，將劣化成一股盲目的創科潮，使在花費了大量資源和時間後，仍看不到顯著的成果。香港創新科技發展一直未如理想，究其原因，往往並非單一因素，但缺乏相關人才卻是主因之一。當中的問題並非只是資源不足，而是決策者對創科的本質的認識未夠全面，而且過於技術化，導致人才培訓也過分傾斜。

香港過於着重硬件

除了數碼港外，另一個類似和同樣矚目的項目便是科學園。兩者的發展模式和假設十分類似，也是參考了世界著名的創科地區美國加州的「矽谷」(Silicon Valley)的模式，把科研的中心放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學之旁，以促進由大學至業界的知識轉移及產業化。依照這個道理，很明顯矽谷背後的是史丹福大學，而數碼港及科學園的伙伴大學分別是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在「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情況下，理論上香港應該更有優勢，因數碼港與港大、科學園與中大的距離甚近，甚至步行也可到達，更有利學界與業界的交流與互動。

「發展型國家」已不合時宜

自殖民地年代以來，香港的發展模式也是透過官僚由上而下帶動。這個被視之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模式對推動快速工業化甚為有效，並成功在上世紀締造了「亞洲四小龍」，即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的東亞經濟神話。可惜，這些均已成為了歷史，套用舊的發展模式在創科發展之上，只會適得其反，事與願違。箇中的主要原因，是當年所需要的發展只是快速地複製西方的工業化過程，效率至上，不需要太多的創意和多方面的思考，因此以官僚來主導成為了一個既輕易而又合適的策略。除此之外，工業化年代的投資和生產模式也是非常簡單直接，只要投入更多資源，便有更多製成品。而殖民地年代的人才培訓，運作邏輯和工廠內的生產線也十分相似。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便更容易明白香港現時創新科技發展策略的局限和問題所在。基於舊世代已不合時宜的「發展型國家」，及官僚主導和工業化思維所害，便帶

來了以上提及的種種問題，包括了過分着重於硬件的發展，用有多少個什麼園或什麼港的數量和面積等指標，來衡量成果。

創科人才培訓不平衡 顯示決策者局限

在人才的培訓上，也有至少兩大問題，第一也是源於工業化時期的遺害，簡單地認為人才培訓和工業化生產一樣，只要投放資源，便能生產相關數量的創科人才。第二便是認為要發展創科，只需要大量生產技術人才，但卻忽略了負責策劃及管理創科的人才的重要性。

以筆者所熟悉的數據科學（data science）範疇為例，近年香港不少主要大學均有開辦專注的技術課程，甚至成立相當有規模的數據科學學院，教授同學相關的電腦、統計的科技知識和編寫程式（coding）的技術。但與此同時，把數據科學、科技管理，及政策分析和制定結合的課程，卻相對地少，甚至可以用罕有來形容，而筆者有份負責的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便是其中之一。

少數和罕見絕不代表不重要，物也以罕為貴。但由於香港的學士學位課程的名額主要是由政府資助，這便反映出政府在創科人才培訓的重點，和教育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現況並不理想，也折射了工業化年代的官僚思維，把生產徹底簡化為資源的投入，有技術人員已足夠。有關創科管理的知識被視為虛無和次要，而官僚自己也沒有動機去培訓任何人，來取代自己在創科上的現有的主導角色。

創科人才培訓的不平衡，所顯示的也是現時決策者對創科發展的誤解和局限。很多創科的成就及奇蹟，特別是在推動產業、經濟發展、改善公共服務及人類的生活質素上，均不是純粹來自科技上的突破，而是在於科技的管理和運用之上。

忽視創科人才培訓問題嚴重性

如何把科技和人類生活及社會需求結合，進而顛覆過往的假設和企業的操作，產生更大的價值，這便是由哈佛大學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所提出的「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意義（註）。例如，發明數碼攝影的是柯達（Kodak），但因這科技出現的時刻，柯達已變成了太大和太官僚化的機構，不善於對新科技的管理和運用，看不到數碼攝影為人類未來生活帶來的轉變和機會，甚至愚昧地視它為現有菲林攝影業務的威脅，放棄進一步發展。故事最終的結局，是柯達今非昔比，幾乎破產，但它所發明的數碼科技，卻成就了如 facebook 等的公司的無比成功。

如果香港創科的發展不成功的話，之前所培訓的技術人才，只有轉行或離開香港發展，所有努力均前功盡廢。因此，我們絕不應該忽視香港只集中培訓技術人才，

而忽略了管理創科及發揮其價值的人才之問題的嚴重性。這並非學生學少了東西的課程設計不全面的小事，而是涉及香港整個創科產業最後是否可以真正起飛的重大前途。

註：Christensen, Clayton M. (1997)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本文略經刪剪，原文請參閱明報網上版〈文摘〉 2021 年 11 月 8 日。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11108/s00022/1636017909147/%E7%9B%B2%E5%89%B5%E7%A7%91-%E8%A2%AB%E9%81%BA%E5%BF%98%E4%BA%86%E7%9A%84%E7%AE%A1%E7%90%86%E7%A7%91%E6%8A%80%E4%BA%BA%E6%89%8D%EF%BC%88%E6%96%87-%E9%BB%83%E5%81%89%E8%B1%AA%EF%BC%89>